

乌鲁木齐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工商经济史料专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乌鲁木齐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(工商经济史料专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目 录

从“赶大营”兴起的百货业·····	刘竹溪 (1)
永丰·新光与万家灯火·····	管玉林 (6)
从手工业到现代工业·····	刘荫桐 (11)
从家什窑到陶瓷厂·····	柴恒森 (23)
漫谈解放前的煤炭生产·····	金国珍 (27)
乌鲁木齐黄金生产小史·····	魏长洪 (34)
乌鲁木齐的水磨业·····	柴恒森 (40)
从笼箩木器行到笼箩木器厂·····	朱春圃 (45)
乌鲁木齐的肥皂业·····	李 富 (50)
糕点与醋酱·····	杨梦九 (55)
乌鲁木齐粮油加工业的兴衰·····	金国珍 (59)
乌鲁木齐皮革业漫记·····	谢力甫 (67)
新疆“红钱”与乌鲁木齐机器局 ·····	柴济森 (69)
解放前的南门市场·····	尔 昌 (73)
民生药房开设前后·····	易 耀 (77)
乌鲁木齐五十年中药店简况·····	王楚凤 (84)
乌鲁木齐的货栈业·····	李 富 (89)
从“带诏”到理发馆·····	杨梦九 (94)
群众饭店缘起·····	王得瑜 (97)
市区交通的演变·····	杨 彬 (101)
解放前后私营汽车运输业概况·····	李文惠 (105)

沙依巴克工商区的发展历程..... 赵景隆 (110)

乌鲁木齐农林业生产的旧貌与新颜..... 卢寒峰 (117)

乌鲁木齐畜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..... 马成基 (122)

解放前乌鲁木齐的水利建设..... 柴恒森 (129)

为各族人民所爱戴的肉孜阿吉..... 谢力甫 (137)

辛亥革命前的新疆石油史料辑录..... 王连芬 (153)

外商洋行与迪化“贸易圈”..... 咎玉林 (171)

吉祥涌洋行始末..... 色里木格来 (178)

从“赶大营”兴起的百货业

刘竹溪

从近百年来乌鲁木齐商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，百货行业居各行业重要地位，它的兴衰历程不仅关系着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好坏，而且可以说是旧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一个有力的佐证。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办“工商经济史”专题讨论颇有意义。组稿同志约我写一篇有关百货业的专题，确有力不胜任之感，因为自己过去对这方面的问题，没有研究过，恐写不出有参考价值的材料来。但考虑到既是为研究历史提供一些资料，只得接受。我走访了几位过去从事百货业的老人，加上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听父辈们谈论过的一些有关情形，汇集出这篇个人见闻。

“八大家”与百货业

一八七六年（清光绪二年）有天津杨柳青一带的流动货郎担和二百多名农村贫民跟随入疆清军，挑着零星货品和中成药的担子，一边走路，一边销售，叫做“赶大营”。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安家落户，在街头摆摊设点做生意。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，有的人开了店铺，买卖越做越发展，这批人成了复兴乌鲁木齐商业的主力。其中有些善于经营的商店，以后成了乌鲁木齐有名的“八大家”。在当时的“八大家”中，除了

复泉涌是酱园兼营糕点、海味食品外，其余各家都是经营百货业的。这里所说的百货业，当时不称百货，而称京津杂货，或者绸缎呢绒。到清末民初年，“八大家”生意最为兴隆。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，实行闭关自守、愚民政策，但对商业还是支持发展的，维护货运畅通，保持银色稳定。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，促使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以经营百货为主的津帮商人业务做的灵活，比较大的商号都在京津设庄驻人，购置货物，并在南北疆设分支机构，扩展业务。由于百货业销路畅通，不仅京津商人经营百货，而陕甘帮、山西帮商人也纷纷转营百货，一部分经营土特产品的少数民族商人也经营起百货来。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，百货行业不仅有开设门市的坐商，还有摊商，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贩运的行商。抗日战争初期，乌鲁木齐的百货商店发展到二百多户，全行业从业人员约五百人左右，是全市工商界最大的行业。这也是百货行业发展最兴旺的时期。

经营特点和社会效益

百货业最大特点是善于经营日用百货，品种繁杂，国货、洋货都经营，且注重运销时兴商品，所以城乡居民颇为欢迎。其次是利润雄厚，如从天津置货主要依靠驼运，经数千里路程需时四个多月才能运抵乌鲁木齐，一年也只能办货一趟，资金周转虽慢，但是有些紧俏商品可获一倍以上的毛利，因而来货的大商号资金积累很快。在杨增新时期这样的来货家在百货行内仅有二十余家。也有通过邮包运货的，因邮费较高，多是邮寄应时快销的细软货物，利润亦相当可观。至于零售坐商或摊商，获利虽小，但其资金周转快，而

且可凭信用或有人担保从大商号赊购货物。大商号和行商能从内地大批运货来疆,对供应市场需求,繁荣地方经济,抵制外国“洋行”垄断商品市场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。而且他们可以组运“回货”,即是将新疆地产的羊毛、驼毛、皮张、革皮、肠衣、棉花、中药材及其他土特产品运至口内天津等地销售,又换回来货,对沟通新疆与内地物资交流和活跃市场经济起着良好的作用。随着这些商贸活动的开展,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。《新疆图志》上说:“西域番(指少数民族)汉杂处,联系融洽,多藉商力”,这确实是历史事实。百货业由于不断总结经验,凡是从内地置货的,都多方面研究各少数民族的需要,置办他们喜爱的各种花色的绫罗绸缎、毛呢花布、条子绒、直贡呢等商品,还订购民族形式的各种瓷器,如有花纹图案的小茶盅、吃饭用的大瓷碗、盛抓饭的大型花瓷盘,以及烧茶用的大小铜壶等等供应市场,甚至连蒙古人用作宗教礼品的“哈达”、哈族牧民所喜爱的铜纽扣都注意进货;因此,颇受兄弟民族的欢迎和称赞。另一方面,在百货业经营活动中,汉族商人与民族商人之间商业交往也日益频繁,经常相互协作,如经营皮毛土特产品的民族商人运至天津的货物销售后有大量现款,向汉族置货商号收兑汇款,“汇水”较在钱庄兑款利率要低。还有不少合作合伙经营的,彼此关系融洽,各得其所,经年累月结成了好友。历史证明,在乌鲁木齐经营百货业的商民,不仅与本市各民族商民关系融洽,在全疆范围内亦是交往密切。

从繁荣走向衰落

自一九三一年起，由于统治新疆的金树仁实行反动政策，激起哈密农民暴动，接着马仲英率兵进入新疆，与金树仁争夺地盘，从此新疆战乱不断扩大，使新疆与内地的交通线受到破坏。特别是反动军阀盛世才趁机窃得新疆统治地位以后，戴着“亲苏联共”的假面具，推行一系列残暴的反动政策，断绝了新疆与内地的货运交通，由于货源不济，一度兴旺的百货业与其他各行各业遭到同一厄运。经营业务日渐萧条，年复一年，只得坐吃山空。一些商号由于亏损，接连停业，有些经营少量苏联货以维持门面，或是转业他就以谋生计。也有别出心裁寻求经商出路的，却遭到无情打击，如百货商店福泰成经理石寅甫联合几位商界人士，集资开办“维新公司”，打算收购皮毛土产等换取苏货扩展经营，筹办不久就被盛世才查封。更为甚者，盛世才不仅疯狂制造冤案，大肆逮捕杀害支援新疆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、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学生，就连工商界也加以残酷迫害。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捏造罪名先后逮捕迪化总商会会长石寅甫、韩君璧并把他二人杀害狱中，逮捕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曾当过商会会长的曹余三、崔善祥、周海东和胡赛音等人，无故关押多年；同时，还于一九三七年九月捏造“通敌”罪查封了同盛和、同泰兴、德兴和三家百货店，逮捕了三店的经理人，德兴和经理阎应五被杀害狱中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新疆处于盛世才白色恐怖之中，工商界处境艰难，但是，他们不忘爱国，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大力宣传抗日救国运动的鼓舞下，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各项活动，并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，慷慨解

囊，踊跃输将。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五月，乌鲁木齐工商界认捐、献金的款值约合银币七十二万多元，占全疆募捐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。在捐献活动中百货行业发挥了积极带头作用。

抗战胜利后，工商界满怀喜悦，企求有个好转机，但事与愿违，美好的憧憬竟成泡影。盛世才虽已下台，而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变本加厉地对各族人民进行盘剥，工商界首当其冲。国民党反动派强加的苛捐杂税，名目繁多，有增无已，工商业户负担日益加重，不堪忍受，叫苦不迭；反动当局滥发钞票，竟出现了六十亿元票面的纸币，纸币毛荒，物价一日三涨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商民今天卖出一匹布的钱，明日用加倍的钱也补不进半匹布来。市场上投机倒把盛行，不少人专搞倒卖黄金、银元的勾当，黑市猖獗，市场金融一片混乱，不可收拾。更有一些国民党反动派军政人员亦官亦商，趁火打劫，他们凭借官势，利用军车、飞机私运货物，投机牟利。甚至挪用军饷钞票在市场上抢购物资，转手高价售出，谋取暴利。许多工商业户破产停业，勉强支撑门面的商户已趋走投无路的境地，只有坐以待毙。曾经繁荣了一百多年的乌鲁木齐百货业，到解放前夕，被摧残得奄奄一息，他们渴望解放的心情，自然不言而喻。

永丰·新光与万家灯火

咎 玉 林

永丰、新光与万家灯火说的是乌鲁木齐电灯演变的历程。

清朝末年，随着国内“务洋”运动的喧嚣，新疆地方当局也曾大喝大叫，“要实现照明电灯化”，但是喊了多年，只闻雷声不见雨点，老百姓风趣地说：“闲扯蛋，难见面”

（按：“闲扯蛋”是“线掣蛋”的谐音，指电线连接着电灯泡）。辛亥革命后，民国督军杨增新发誓赌咒，要在最短期间让“线掣蛋”在省城出现。然而空谈毕竟不能成为事实。一直到一九一五年（民国四年），才在实业厅的衙门口挂出了一块“新疆电灯公司”的空招牌。发誓也罢、挂牌也罢，终归还是“闲扯蛋”。事隔五年（即一九二〇年），杨增新为急于自己先开“洋风”，遂将清末时期炼油未成、闲置多年的一台俄造小锅炉，从仓库里翻出来，雇了两名白俄电工，将锅炉安装在他的督军衙门里发电，从而杨增新的“补过斋”不再是烛烟缭绕的阴暗角落，而成了电光闪烁的书屋。

唐诗人杜甫在《小至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”，正当杨增新把“与民同乐”的信条忘得一千二净，独享“洋福”的时候，一位名叫吴兆熊的地方开明人士，于一九二七年在西陲边城吹响了一支“春曲”，

由他发起筹办“永丰电灯公司”。吴老先生不亏是一位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人士，他在发起书上带头献资纹银一万两，不几天，各大商号和居民户富，又筹集了四万两。这五万两纹银数额虽多，但是要开办一所电灯公司还有相当大的差距。吴老先生就联络了几位社会上层人士，劝说杨增新开库资助，提出的优惠条件是：一、公司作为官商合营，商股五万、官股三万，公司如果亏损，全由商股分担，官股如数交库；二、督军衙门所需电灯，优先安装；三、为昭督军“威信”，公司保证在一年内发电。杨增新本想再施权术，婉言拒绝，但是吴老先生所陈述的三项优惠条件，说得他哑口无言，只得默认了三万两纹银的官股。

经过吴兆熊等人的多方奔波，公司地址选在藩正街（今明德路第一小学对面），“永丰电灯公司”的牌子一挂出，在实业厅门口空悬了十二年的“新疆电灯公司”的牌子默默地摘掉了。永丰电灯公司的地址选定后，公推吴兆熊为经理，并委派他前往伊犁购置机器，不久，就从一个流亡在伊犁的白俄手中，购得一百五十匹马力的旧蒸汽机一台，又从国外购进了电机、电料等器材。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筹建，永丰电灯公司于一九二八年的中秋之夜发电放光，全市一千多盏光灿的电灯，映着皓明的月光，招来观光人群，把四大街拥挤得水泄不通。只是那位“补过斋”主杨增新，未等“与民同乐”，在电灯放光前两月就一命呜呼了。

一九三三年盛世才上台后，为了“扫荡旧时的群丑”，于一九三四年逮捕了吴兆熊，查封了永丰电灯公司。另在当时北梁金公祠外院（今北门第一人民医院南侧）新修了一所锅炉房，将原永丰公司的机器拆迁到新修的锅炉里，于一九三五年发电，专供盛世才的督办公署使用。锅炉房由东北义

勇军中的电工李志云任主任，新招了二十四名本地青年当司炉工。从此，永丰电灯公司的印象，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逝了。

永丰电灯公司倒闭后，乌鲁木齐商人杨元富在他经营的“德元电影公司”的基础上，于一九三四年从苏联购进二十四匹马力的锅炉一台，二十匹马力的直流发电机一台，开办了“德元电业公司”，使大十字一带又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电灯光。钱少力薄的德元电业公司，勉强维持了一年，已趋焦头烂额，精疲力尽的状态。杨元富为雇全公司“体面”，通过工商界知名人士周海东的斡旋，由总商会提出倡议，由吐尔逊巴巴牵头，募役开办“迪化电灯公司”。募股办法为官股一半，商股一半，在一半商股中，德元的机器和吐尔逊巴巴的现金占百分之二十五，所余百分之二十五向工商界募集。办法报经省政府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批准，任命吐尔逊巴巴为筹备处主任。公司地址选定南梁原美商璧利洋行经理格米里肯（白俄）房后的一块官地，东西长为二十七丈，南北宽为二十四丈，总面积为六百四十八方丈。省政府于二月十一日召开第一百四十一次会议讨论决定，官地每平方丈以二元计价，共值现洋一千二百九十六元，作为公司官股，由建设厅行使权利。过了一月，财政厅长胡寿康提出异议，认为原定地价过低，每平方丈应按四元计价，共值现洋二千五百一十二元，省主席李溶于是三月二十日批准了胡寿康的建议。因此，公司基建动工不久，即发生经费困难问题，虽经吐尔逊巴巴一再要求政府贷款，都未得到解决。公司筹建人员只好因陋就简，以德元原有设备为基础，增添了部份新设备，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宣布建成，正式定名为“新疆迪化新光电灯公司”，由省政府任命吐尔逊巴巴为总经理，周海东、

杨元富为副经理，公司职工共为七十人。八月一日发电放光，全市几条主要道路和沿街各大商店“新光”灿烂，观光人群不亚当年“永丰”。事过一年，公司向市政府索要现洋两千余元的路灯费，市政府以“公益金有限”为理由，要求省政府饬令沿街商户摊付；商户认为“公用路灯，由商户摊付电费不合情理”，上下推脱，电费收入不得落实，后经盛世才批示：自一九三七年八月起至一九三八年元月止，路灯电费由市政府向各商户征收交付，二月以后电费加征公益捐支付。盛世才为强迫行事，又将吐尔逊巴巴诬加“反对政府”罪，逮捕入狱。商户在盛世才恐怖政策的威胁下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负担着全市三分之二的电灯费。

盛世才逮捕了吐尔逊巴巴以后，任命周海东为公司总经理、杨元富仍为副经理，并派任栋梁为第二副经理。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，由他们三人联名，向银行贷款，由苏联购进五百马力新式蒸气机一台，三百六十瓦特发电机一台，五十瓦特变压器三台，以及可装一万支灯头的各种电器材料。这批新设备投产后，供电情况虽有好转，但各用电单位拖欠电费情况严重，公司维持困难，遂于一九四一年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，通过续募商股二十万元的议案。议案虽然通过，但工商界人士慑于盛世才的暴力镇压，人心惶惶，认股者寥寥无几。周海东为苟延公司残喘，冒着风险向盛世才呈交追收电费的报告，不料报告石沉大海，周海东本人也遭到了逮捕入狱的噩运。周海东被捕后，盛世才煞费心机，提升任栋梁为公司总经理，并拉出永康号百货商店的财东韩君璧为副经理，妄想借助韩君璧向工商界施加压力，出资办电，然而韩君璧无能为力，不久就步入吐尔逊巴巴和周海东的后尘，连自己经营的永康号也被查封没收。

从一九四二年以后，新光电灯公司日趋衰落，尽管任栋梁曾提出在南梁十七户筹建水力发电厂的建议，毕竟还是痴人梦呓。从一九四四年到解放前夕，新光电灯公司虽然继续供电，但早已陷入“电灯不明，电话不灵”的悲惨局面，用户不得不在电灯底下点着油灯工作。

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，新疆和平解放的礼花，把沉眠在长夜里的乌鲁木齐照耀得光灿灿，几盏稀稀疏疏的“新光”电灯，更显得暗淡无光。

解放给乌鲁木齐带来了无限光辉，一九五二年，装机总容量为两千四百瓩的乌拉泊水电厂建成投产，一九五三年，装机总容量为五万九千瓩的苇湖梁新型火电厂建成投产，一九八二年装机总容量为三十万瓩的红雁池火电厂扩建投产。这三座由国家投资，在乌鲁木齐建成的现代化发电厂，拥有职工两千多人。从这里输出的电源，有力地推动着乌鲁木齐和附近各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；从这里输出的电源，把乌鲁木齐装缀得五光十色，明丽灿烂。如果有人登上红山观赏乌鲁木齐的夜景，他会陶醉在万家灯火的海洋里；如果有人乘坐夜班火车，沿循着半圆型的铁道，由乌拉泊徐徐进入南站的时候，居高俯瞰，宛若乘坐飞船在星云密布的太空中遨游。

从永丰、新光到万家灯火的今天，恰好是一个花甲；六十年来，“线掣蛋”留给乌鲁木齐的印象，正是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。

从手工业到现代工业

刘荫桐

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手工业，是城乡经济重要的一环，农业生产使乌鲁木齐从草原发展为城市，也为手工业生产繁荣创造了发展的条件。乌鲁木齐建城于一七六七年，纪晓岚在一七七一所写的《乌鲁木齐杂诗》中就有“戍屯处处聚流人，百艺争妍各自陈”的记述。并在杂诗注释中说：“流人既多，百工俱备。”确是如此，由于当年屯垦开始时，内地移民源源而来，其中就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，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，使金、木、土建工匠基本齐全，他们首先在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据史料记载：乾隆二十三年（一七五八年）给屯兵“增拨农具七千付，动员商民造车三千八百辆”，就是手工业生产发展的佐证。当时，作为建筑材料的砖瓦、石灰和石料加工，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
由于城乡经济的发展，从事生产资料、生活资料生产的手工作坊，如水磨、油坊、农具制造，以及煤炭、矿冶资源的开发，都是以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发展起来，并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形成各自的既依存又互惠的关系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，这种小生产经济逐步走向困境，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，小手工业生产已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。现将它们的演变过程概述如下：

一、矿冶生产的兴衰和现代生产

古代时期，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，丝绸之路的开通，就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我国西域地区。冶铁是我国最先发明的，它象征着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，早在二千年前已传到西域。古籍《水经注》中就有古代时期以“石炭冶铁”的记载。

清代平定准噶尔贵族集团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后，在开展军垦的同时就开发了我国传统的冶铁生产，奠定了社会生产基础，据史料记载：“一七六二年在喀喇巴勒逊（今达坂城），昌吉河（今头屯河）采矿炼铁，制造农具”；“一七六五年在乌鲁木齐东北郊建铁厂”；“一七八四年设乌鲁木齐铁厂”（在今乌鲁木齐东铁厂沟）等等。史料还记载：伊犁将军在伊犁一带开矿冶铁；南疆的拜城有铜、铁矿，焉耆、库车、英吉沙等地有铁矿（见《新疆图志》卷六十）。

作者四十年代去过铁厂沟，五十年代初去乌鲁木齐达坂城东沟，调查过喀喇巴勒逊铁厂遗迹。那里还残存着排排工房——残垣断壁，前面有十余座土高炉，炉体虽已倒塌但底盘尚有融渣、炭核等遗物，炉旁还有好几堆铁矿石。这个矿山既有铁矿也有煤矿，还产有坭子泥（即耐火土）。纪晓岚对乌鲁木齐水磨沟铁厂的记述说：“温泉东畔火荧荧，扑面山风铁气腥”。还记载役工八十人日炼铁五百斤，每用矿石百斤炼生铁十三斤。又据一七九五年统计：“乌鲁木齐铁厂存生铁一百一十万斤，熟铁七万斤。《三州辑略》中说，乾隆三十年（一七六五年）办事大臣伍弥泰奏称：“查现在

铁厂每月出生铁四千八百斤，年产五万七千多斤。生熟铁器均能铸造；所铸农具尚堪使用，较之内地运来大为节省。”可见当年冶铁对于农业生产是多么重要。

至于当年矿山兴旺的情景，现举出吉木萨尔的水西沟铁矿区，可见一斑。

“水西沟在乾、康之际，商人崔占元开设铁厂，自开办以来出产极旺，远近流通：内至甘、凉州外及蒙、哈争相运取。”可见当年产品不仅供应本地还运往内地，远销到蒙古和新疆北部牧区。因此朝廷给予奖励，“时人以为荣”。叙到矿区繁荣景象时史料记载：

“居民数千家隐若巨镇，斧斤之声闻于十里……”。

对其结局如何呢？史料也有记载：

“到同、光之乱后已萧条；自与俄通商，洋铁输入，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全废。”史料还记载：“光绪三十二年仅迪化道就进口俄国铁器计值一万二千卢布。”（以上均据《新疆图志》）。

新疆建省后虽拨款恢复农业生产，并试图发展实业，但是钢铁生产规模较大，在当时情况下，地方当局是不敢问津的。一九四四年国民党设想在乌鲁木齐兴办冶铁厂，但当时已临社会经济崩溃的边缘，空喊了几年，也就无声无息了。这段时期，只有民间的铁器加工业，如浇铸农具和生活用具的炉院，打造熟铁制品的红炉还能勉强维持。

解放后现代化钢铁生产开始起步。一九五一年筹建“八钢”，五二年投产。三十年来不断改进技术与充实设备，一九七八年已突破年产钢材十万吨大关。当前生产的生铁和钢材产量，占全疆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五，已发展成钢铁联合企业了。